

上海福建人中,闽南人居多,其次是闽西人。闽南地区推崇“过番”、“出洋”冒险,到外面闯世界。闽南本来就不适宜农耕,商人出海归来,常常带回大把大把的钞票,于是,“出海从商”就成了闽南人的最佳职业选择。自古以来,闽南做生意的就特别多,经商成为他们崇尚的一个职业。闽南人一生下来耳闻目睹的情景就是祖辈父辈外出经商,所受到的教育就是“经商好,商中自有黄金屋,商中自有颜如玉”。祖祖辈辈异地漂泊的经历,培育了他们勇于开拓的性格,同时也成了争强好胜的一族。上海小刀会起义中,无论在捉放吴健彰还是如何支配夺来的道库银两等问题上,福建人在与各帮的协调上缺少了些委婉和通融。这样,在强敌当前的情况下冲突迅速表面化。

除此之外,上海福建人强烈的乡族认同意识和争强好胜的个性虽是能迅速聚起的重要因素,但起义发展过程中却又成了各帮密切协作的障碍,为起义组织中各帮协调合作留下隐患。英国领事阿利国于1853年9月9日发布的通告说:“在占领城厢的属于不同省份的武装人员中间,发生剧烈的内讧,主要在福建帮与广东帮之间,为了争夺统治地位,恐有演成血战的危险。”^①上海小刀会起义部队有七帮,主要是福建人与广东人。福建人与广东人在生活习性、宗教信仰方面有很多一致性,应该更容易合作,然而恰恰是地域相近的两帮,彼此之间的矛盾也最为突出,并贯穿起义全过程,直接影响了起义的成败。从起义当天所发布的文告中已显端倪。广东帮首领刘丽川以“大明国统理政教天下招讨大元帅”名义发布文告,李咸池则以“平胡大都督”名义张贴告示,刘丽川、李咸池、陈阿林、陈芝伯、林阿福又联合以“奉天承运开国元勋”发布告示,“各怀意见,令出多门”^②。接着又出现李咸池离队,舍近求远,到福建去搬救兵。而后又是林阿福带着一批人离开县城,不知所往。而留在上海县城中的福建籍起义军仍未与广东帮同舟共济,冲突的记载同时频频出现在外国人的报道、清朝政府的情报中。对上海福建人而言,畛域之别和强悍、好胜的性格即使不是起义失败的唯一因素,也是绝对重要的因素。

闽商会馆的参与和部分上海闽商的卷入并未对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性质和过程起决定性的影响。但小刀会起义的失败对上海福建人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这成了上海福建人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海福建人的人口数量急剧下降,以后也从未达到上海小刀会起义前的规模;二是上海闽商的商业活动受到

^① 《北华捷报》第164期(1853年9月17日),《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309页。

^② 佚名:《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37页。

很大打击,这几乎成为上海闽商在城市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发生变化的转折点,也可以说是上海闽商整体退却的一个起点。

美国传教士这样描述上海小刀会起义:“策动和进行叛乱的是广东、福建两帮,而福建沙船上的船夫,却是叛党的主体”^①,清政府悬赏捉拿4名小刀会首领刘丽川、陈阿林、林阿福、李咸池,其中三人是福建籍。因此,小刀会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对在沪的福建商民采取了非常严厉的镇压措施。对上海县城,特别是县城东南十六铺码头一带进行了多次纵火和洗劫。小东门外羊毛弄、福建街一带的大火延续了4天,大小东门外到法租界南端一片废墟。这里原是上海县城商业的繁华区域,也是福建商民活动、居住比较集中的区域,“士民市庶逃窜乞哀,昏夜号哭,焚死被害者何可胜道!所房器用财贿,载入广艇大舟而去”,“百年富庶精华,席卷殆尽”。^②遭此劫难,上海福建人自然损失惨重。上海闽商中比较富丽的兴安会馆、泉漳会馆、点春堂不是被占领便是被焚毁,闽商的损失可见一斑。更有甚者,起义失败后,上海地方政府制定了严厉制裁闽、广人的措施,旨在铲除上海福建人的生存基础:首先是“毁巢穴,清逆产,以绝根株”。将上海福建人的聚集地房产店铺充公,会馆建筑烧毁。他们认为“小东门外羊毛弄、福建街为闽广游匪窝藏出没之所,此次刘逆酿乱,即由该二处起事,业将贼巢烧毁净尽,所有基地,概行入官,勒碑永禁,不准再造民房,其贼匪所置房产店铺货物,逐细清厘,籍没入官”。其次,“永禁闽、广人入城居住。所有城内从前建造会馆公产,并私置房铺,一概入官,变抵充公。旧址冢地,勒碑圈禁,并将贼尸移出城外空地,归骨一墟,叙明创乱始末,刻石标垂,警心触目,流传千古,以昭炯戒而息众怒。”第三,“严逐舢板船进浦渡载”,“口外泊船,以消祸萌也”。由于闽、广人中许多是些“撑驾马蹄杉(舢)板小船,在于黄浦摇摆”的船户,小刀会起义中,这些船户“弃舟从逆”,因此,要将“在浦船只,锯断将干示众,并于吴淞口勒碑永禁,不准此等小船进口渡载,如敢抗违,即行轰击。”而“闽、广蛋船、鸟船,向泊黄浦”,由于此次“从乱如归,非帮同拒敌,即设法接济,罪不容诛”,以后“准在吴淞口外停泊,不许进入黄浦,货物用内地船只驳运,并倍征关税,薄示惩罚”。第四,“连环互保”,^③主要是稽察闽、广流民。上海福建人经此打击,不仅财产损失很大,而且继续谋生也困难重重。即使在小刀会起义过去许多年,清政府及上海的外国人对上海福建人仍心有余惧,采取歧视政策。1851年,

① [英]约翰·斯嘉兹:《在华二十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521页。

②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863页。

③ 《吴煦上吉尔杭阿禀 附善后请奏条款》(1855年4月10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4辑,第81—8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泉漳会馆曾在“北门外二十五保五图圩地,建造泉漳北馆一所,供奉观音大士神位”^①。也有“泉漳别业”之称。此时,该处被划在法租界内(今址金陵东路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法国人一怕停柩不卫生,二怕上海福建人强悍,易滋事,强使清政府勒令会馆搬迁,会馆极力抗争无效,只得放弃这数十亩地。当然,就上海闽商而言,他的整体退却与上海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城市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化有着必然的联系,但是,小刀会起义失败明显使上海闽商的生存环境和经商环境失衡,闽商在一些行业逐渐地退出也是事实,上海闽商整体退却由此而始。

资料表明,上海闽商在沪商业地位节节下降的同时,上海福建人的人口数量也急剧下降。开埠前后,上海福建人6万左右,1885年,公共租界内的福建籍人口只有708人,到1930年,“华界”12173人,公共租界3057人,^②1934年为13196人^③,再也没有恢复到小刀会起义以前的数字。如果将上海福建人的数量变化与有着同样遭遇的上海广东人作一比较,在清政府同样的制裁政策下,广东移民数确实在一段时间里急剧下降了,但在近代百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总的倾向还是持续上升,到民国时期,在公共租界与华界中已超过8万。而上海福建人的数量华界和公共租界加起来远远没有超过它原本最高的数额,即使在1852至1890年间上海人口猛增之际,福建籍人口却在下降,个中因素虽然复杂,但至少与上海闽商的商业活动有关。上海闽商的商业活动与移民往往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商业活动的兴盛会推进移民的发展。五口通商,尤其是小刀会起义后,上海闽商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和生存环境都发生变化,移民上海的势头自然减弱。

三、曾铸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

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不仅由上海闽商领袖发起领导,上海福建人也是其中较为积极的群体。这场运动以实现目标效果而言,并非是近代上海乃至全国比较成功的事例,即它并未迫使美国取缔原有的排华法案,它的醒目之处应该在发动、发展的手段与方式,华侨、商人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学术界的研究,虽从未形成热点但也一直没有停息过。20世纪80年代前与80年代后的研究都有一定深度和广度,80年代之前更凸显的是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运动的发展、资产阶级的成长与软弱

① 《上海县为泉漳会馆地产不准盗卖告示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233页。

②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4页。

③ 《二十三年上海市民籍贯统计》,《上海市年鉴》,中华书局1935年版。

等主题,80年代后则侧重于中国商民民族国家观念、主权观念的觉悟,商人团体、商人试图主导、影响政府决策的新气象等。其中都涉及到了商人群体总体性和差别性问题,但其解释是商人组织和团体的不成熟等,笔者以为这样的解释过于简单化。

20世纪初的上海闽商,就整体而言并不占据上海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优势,在抵制美货运动前,作为闽商领袖的曾铸只是上海商务总会会董、上海城乡内外总工程师局办事经董。他除了延续上海闽商乐善好施的传统,创办上海贫儿院和劝导禁食鸦片的振武宗社外,并不比晚清的另一位上海闽商苏升更有影响。但1905年他领衔上海商务总会禁用美货,以此掀起近代中国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由此名振天下,尤其是他在运动中发表的《留别天下同胞书》,言词慷慨,有着在死亡威胁面前大义凛然之气概,以致“歿后数年……兹由沪上同人纠集巨资,请沪南求新厂铸就紫铜质之遗像。闻造成后,拟安置于贫儿院前,以传流后世,永为纪念”^①。

曾铸,号少卿,原籍福建同安,海商家族出身。“父初泰,董泉漳别墅,同治初,沪北辟租界,力任移墅迁冢,闽旅德之。”^②光绪年间,曾从南洋群岛运米到沪平糶,并热心慈善助济,在同业中声望很高。曾铸在经商方面有着不俗的业迹,他是上海闽商中凭借对南洋的进出口贸易而发家致富的典型。但曾铸在上海的声名鹊起,决非单单因财富丰殷和生财之道的高明,而在于他所参与的社会活动。在抵制美货运动中,曾铸与参与的商人所表现的分歧与妥协,除了人们已经关注到的原因外,还有上海闽商的实力及当时占据商人群体主导地位的是浙商等因素。与之相关联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在这场运动中,闽粤商人表现得最为活跃,华南省份也最积极。美国华侨无论在运动的发动和持续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③这与美国华侨粤人居多有直接的关系。

追溯这场运动的起因,美国排华问题进入中国官方的视野,起之于1901年美国旧金山华侨的来信。1901年美国国会就次年即将期满的排华法案《格里法案》进行讨



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曾铸

① 《曾少卿铜像巍巍》,《图画日报》1—1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② 《上海县续志》卷18,第47页。

③ 吴金平:《美国华侨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论,准备再次以国内立法形式限禁华工。对此,旧金山华侨联名致函两广总督陶模,说近十余年来,赴美华人数量比过去减少一半,如当此美国会讨论排华法案之际,不据理力争,不需数年,华人将在美绝迹,而在美华侨多系粤籍,在当地经商做工获利不少,一旦被逐回国,生计会发生困难。陶模接信后感到问题的严重,便告清外务部及驻美公使,应该力争废约,因为“所禀粤民赖此为生者众,必宜设法力请弛禁,以广粤民生计,自系实在情形”^①。驻美公使伍廷芳也报告外务部“华工在美为数实数不少,若无海外托足之地,则谋生愈难。不能不全力与争,斯于商民有益。”^②于是中美开始新一轮谈判,焦点就是美国排华法案。清末侨务政策及其护侨措施有一个特点,越来越注意采纳华侨的意见和建议作为办事的参考,而不总是将华侨视为“叛民、弃民”,并渐渐以民意作为与西方列强交涉的筹码。

国内仅次于粤商表现得比较激越的是闽商。美国并非是闽籍华侨聚集的区域,闽人在海外人数最多的地区是东南亚,其中菲律宾的华侨闽南人最多,并且“操菲岛的商业之权,特别是零售商,……菲岛零售商的80%在中国人手中”^③;1899年美国在美西战争中取胜,美国人从西班牙人手中接管了菲律宾,对华人移民的限制更为严厉。1902年美国在菲律宾正式实施禁止华工入境条例,只允许学生、教师、商人及旅游者入境,但事实上禁止华工的条例仍然牵延到工商等各阶层。这正是对于美国的排华法案,闽粤人的反应更加激烈的直接原因。曾铸在其他商人,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浙商踌躇不前之时毅然领衔,其中固然有上海福建人热衷社会参与的因素,闽籍华侨在东南亚的遭际更是重要影响因素。在1905年的运动中,不仅上海闽商中著名人士如苏本炎等参与了运动,知识精英严复、李登辉等也非常投入。由于曾铸与李登辉的关系,李登辉倡创的留学生为主体的“寰球中国学生会”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溯源上海抵制美货运动掀起的具体过程,亦可知上海闽商在其中的作用。1905年5月10日,在上海新闻舆论界已沸沸扬扬的情况下,上海商务总会召开各帮商董参加的讨论对策会议。曾铸以福建帮代表、普通议董的身份上台演说,“激昂慷慨,语语动人”,力主以两个月为抵制美货的期限,如两个月后,美国仍强我续约,则“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为抵制”。他的发言受到在座绅商一致赞成,最后议决分别致电外务部、商部,坚拒签约,电请南北洋大臣合力抗阻,同时通电全国21个重要商埠的商会,

① 《外务部档·侨务招工类》卷33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② 《外务部档·侨务招工类》卷3319。

③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民国丛书》第2编(26),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影印,第52页。

要求通力合作。到此与会者均无异议,但接着在谁人领衔的问题上出现了微妙的局面。当时的上海商务总会控制在宁波帮手中,严信厚(浙江慈溪人)为总理,协理徐润(广东香山人),驻会坐办周晋镛(浙江定海人),他们都对曾铸的提议并无异议,但一旦要领衔通电政府和全国,采取切实的行动时,都“逡巡却顾,重有难色”,在这种情况下,曾铸“挺身捶胸而言”,“此公益事,并无风险。即有风险,亦不过得罪美人,为美枪毙耳。为天下公益死,死得其所,由我领衔可也”^①。此言一出,受到热烈掌声。于是接着陆续所发电文都是以“沪商曾铸等公禀”的名义发出,主要精神便是“相戒不用美货,暗相抵制”^②。曾铸就这样被推上了领导抵制美货运动的领导者位置。

通电发出第三天,上海广肇公所广帮商人首先响应,“广帮绅董大集同乡于广肇公所,到者不下千人”^③,提出三项具体抵制办法。(一)中国无论公私,一概不用美人;(二)华人受雇于美机构、企业者自行辞退;(三)华人相戒不用美货。第4天,闽商也在泉漳会馆集议,“到者几无插足地,尤见建帮同乡感情之挚”。^④曾铸在会上提出五项抵制办法:(一)美来各货(包括机器等件)一概不用;(二)各埠一律不为美船装货;(三)华人子弟不进美人所设学堂读书;(四)华人不在美国商行内应聘任职,(五)美人住宅内所雇华工,劝令停歇,不为美人服务。并相约两月之后,美方若不改初衷,一意孤行,上述各项将立即实行。^⑤显然这些抵制方法较通电提出的“相戒不用美货,暗相抵制”的主张已前进了一步。

从5月到6月,上海一些美人开办的学校中中国教员与学生纷纷响应号召,停课退学。北京和天津各界商民也“函电纷来”表示支持。然严信厚、徐润、周晋镛等仍瞻前顾后,止步不前,既怕承担由此引起的政治责任,又恐媚外华商暗中破坏,使抵制美货的行动难以见效。为此曾铸特地给他们三人写了一封辞意恳切的信,信中说:自“传电各埠后,陆续接准函电,万众一心,一律照办,民心团结,迥异从前,大是可喜”。认为“换约谋及商人,或讶无此政体,此中国向来之说。若外国则索重商权,无一国不咨询后行,所以办理外交鲜有僨事”。让他们打消顾虑,理直气壮地参与国家的内政外交活动。至于媚外华商的破坏亦不过是少数人之所为,如果“大众相戒不用”,少数贩卖美货的华商“虽欲自便私图,我知亦有所顾忌”^⑥。

在两个月的期限内,美国政府通过其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一方面对清政府施

① 《曾少卿留别天下同胞书》,苏绍柄编:《山钟集》第4册,上海鸿文书局1906年版,第511—513页。

②③④ 苏绍柄编:《山钟集》第1册,上海鸿文书局1906年版,第27—28页。

⑤ 《时报》1905年5月13、15日。

⑥ 《曾铸答本埠商务总会严小舫、徐雨之、周金箴三观察》,苏绍柄编:《山钟集》第4册,第474—475页。

压,一方面与上海商务总会领袖人物多次接触,哄骗相加,但曾铸等并未让步。这一时期,名义上严信厚、徐润等仍是上海商务总会的总理、协理,是上海工商界首脑人物,但由于他们的犹豫和畏葸不前,实际倡导抵制最积极、立场最坚定的是曾铸。他四处奔走,八方呼吁,两次上书外务部,通报与美方接触情况,央请清政府“据情力争”,要求清政府在与美方正式签约前必须将条约全文寄与沪商公团,“方能由部画押”^①。曾铸还在报上发表声明,澄清有关他已同意美方“展期”的谣传。

应该说,这场抑制美货运动从倡议、宣传到进入实质性的抵制美货阶段,曾铸起了领导和中坚作用,上海闽商也做了很好的配合。但仅数月间便归于沉寂,其中的原因自然很多。而上海闽商势单力薄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一个制度和市场都不充分的环境中,乡缘意识仍然是一个可以依凭的力量,然而,如前所述,1905年的上海商界,上海闽商已沦为一个小组,闽商在所有的行业包括曾经占有很大份额的行业,都已不占优势。浙商势力最强,其次是粤商。在上海商务总会中,也以宁波帮的势力为主,曾铸作为闽商的代表,在上海商务总会中只是一个普通议董。因此,事实上,从一开始,由于与上海商务总会的领导层观点不尽一致,曾铸基本上以个人或“沪商”出面发函电,而不能用“上海商务总会”名义。曾铸虽还有广帮的支持,但以广帮的行业而言,他们中也有相当部分与宁波帮一样,做进出口生意或与美货有关的行业较多,抵制美货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因此在实质性的抵制行动一开始,围绕“不用美货”与“不定美货”的范围、时间等,众说纷纭。闽、粤商人主张“不用”美货,而宁波巨商们多主张“不定”美货,这样曾铸在没有上海商务总会整体支持的情况下,仅凭民族义愤和个人勇气,及并不强大的上海闽商群体,这就决定了曾铸不可能组织起有效的机构来具体实施他的方案。

1905年底,曾铸被选为总理,这并不代表上海闽商打破了在上海商务总会中浙商垄断的地位,充其量只是曾铸因领衔抵制美货运动而获得的威望所致,这从曾铸的任职时间就可以证明,曾铸任总理时间为光绪三十一年到三十二年(1905年至1906年)^②,仅一年后,上海商务总会重新恢复了由浙商垄断总理之位的传统。

抵制美货运动的效果并不在真正意义上重创美国对华贸易,也未能使上海福建人及上海闽商的境况有所改变,但却展示了中国商人有了与传统排外主义迥然不同的对外方式和理念,包括人民主权思想和全民国家观念的兴起、新式社团和报

^① 《上外务部书一》,苏绍柄编:《山钟集》第1册,第29—32页。

^② 《上海商务总会人员概况》,《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刊等现代传媒的运用、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成长和现代舆论的崛起,以及文明理性的对外精神,因而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以近代民族主义为动员方式反抗西方列强的运动之一。

四、中国共产党与上海福建人

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以后,如果说上海福建人还有什么与政府的对峙行为,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往往能够在上海福建人的组织机构或人际网络中展开活动。这是有案可查的事实。不少在上海经商或谋职的福建人曾掩护或帮助过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至今有确切资料可查的上海会馆中,有三座会馆与共产党有关系,即泉漳、三山、湖州三座会馆,上海福建人据其二。^①上海福建人参与城市地下党活动,乡缘纽带往往是最可资凭借的一种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两所福建人开设的中学:泉漳中学和私立中学。上海完全由福建人投资开设的中学并不多,泉漳中学和私立中学是仅有的较著名的两所,但都有共产党的活动,其中泉漳中学曾是中国共产党活动的重要基地。泉漳中学校址即在今南园公园,是上海闽商最大的一座会馆——泉漳会馆创办的中学,主要为在沪经商、生活的福建子弟有一个接受中等教育的场所,它对闽籍青年有很多优惠条件。国共合作期间已有共产党的活动,1924年,李立三曾在这里执教。大革命失败后,学校仍有共产党活动。1928—1929年,校内建立了教师党支部。1929年11月18日,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在泉漳中学举行,会议延续了9天,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李富春、康生、向忠发、项英等参加了会议,李立三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这当然属秘密活动,但泉漳中学仍被国民党当局视为左倾,1929年,学校被当局勒令停办,校产由教育局接管,校宿作了军队的营房,第二年又被恢复。从1929年—1941年,泉漳中学为中国共产党培养输送了50名干部,故被称为革命熔炉。在泉漳中学任校长的先后有庄希泉、陈文总、吕炳水等。庄希泉是著名商人,又是活跃在南洋和大陆的社会活动家,家族中有多人参加共产党,泉漳中学成为共产党组织的一个重要基地,同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密切有关,同时他也吸引了不少八闽子弟参与中共的地下活动。上海的革命团体“左联”、“社联”、“青年文联”等也经常在此举行会议。1939年,泉漳中学重建支部时,党员数达30人。

私立中学是由上海闽商苏本炎捐助成立的私立学校,苏氏家族对它倾注了大量财

^① 参见郭绪印主编:《老上海的同乡团体》,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



民立中学威海路校门

力和心血,闽商曾铸也曾在开办时大力协助,捐资开办费5 000两,每年还资助规银6 000两^①,使它成为民国时期上海著名私立中学之一。民立中学是一所有着学生运动光荣历史的中学。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民立中学是上海最早的“学生联合会”的发起单位之一。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参加全市“三罢”斗争,学校停课达3个月之久。民立中学有中国共产党活动的确切记录比较晚,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民立中学学生中发展了第一批地下党员。1940年,在李琦涛(解放后曾任高教部副部长)领导下,成立了民立学生的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组织广大同学参加“反汪斗争”,反对私立学校向汪伪政权登记,还向苏北新四军输送了一大批优秀学生。从抗日初期到上海解放,民立中学共有地下党员40多人,在各个革命时期,有好几位民立学生为革命献出了生命。^②著名的左联五烈士之一殷夫,曾以徐白之名于1923—1926年在民立求学。当时正值五卅运动前后,殷夫受到强烈的反帝爱国主义教育,开始了他的诗歌创作。现存的组诗《放足时代的脚印》就是在民立求学时的作品。

1926年到1927年上海工人发动三次武装起义,以往更多留意的是上海工人在起义中的重要作用,而闽系海军部分官兵也参加了起义则大多被忽略。事实上,三次起义闽系海军部分官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次起义时,上海闽商的三山会馆成为起义力量在南市的重要指挥所,至今三山会馆为上海保存最为完好的同乡会馆,但它主要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纪念地而存在。

1926年10月,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轰轰烈烈展开,北伐战争以其迅猛的势头由珠江流域向长江流域推进,武汉三镇已经攻克,吴佩孚的主力基本被消灭,北伐军的战略攻击目标转向控制着苏浙皖赣的孙传芳。上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

① 苏祖斐:《苏祖斐百岁回忆录》,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页。

② 汪国浩、吴珏:《民立中学简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解放前上海的学校》,《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7页。